

中国翻译家研究

TRANSLATORS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方梦之 庄智象 主编



中国翻译家研究

民国卷

TRANSLATORS © 方梦之 庄智俊
THROUGH CHINESE HISTORIANSE I © 方梦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翻译家研究. 民国卷 / 方梦之, 庄智象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446-4424-2

I. ①中… II. ①方… ②庄… III. ①翻译家—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7111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a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ap.com.cn> <http://www.sflap.com>

责任编辑: 张亚东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64.25 字数 745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4424-2 / K · 0085

定 价: 20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编委名单

主编:

方梦之(上海大学)

庄智象(上海外国语大学)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梦之(上海大学)

王建开(复旦大学)

庄智象(上海外国语大学)

任东升(中国海洋大学)

孙 静(上海外国语大学)

陈福康(上海外国语大学)

杨全红(温州大学城市学院)

张 旭(福建工程学院)

张经浩(上海理工大学)

林本椿(福建师范大学)

郑延国(长沙理工大学)

贺爱军(宁波大学)

熊宣东(成都电子工程大学)

黎难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执行编辑: 苗 杨

撰稿人名单

《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

(以撰写篇数为序,篇数相同者以姓氏笔画排列)

黎难秋	贺爱军	熊宣东	袁丽梅	任东升	张旭
肖志兵	王建开	刘永利	杨全红	金文宁	崔峰
王金波	金波	马会娟	方开瑞	方梦之	王少娣
王玉珏	王振平	王燕	印晓红	刘长庆	刘全福
刘佯	陈福康	李文婕	陆颖	辛红娟	宋学智
戎林海	范先明	金圣华	林佩璇	郝晓静	施冰芸
赵军峰	赵颖	高立志	耿强	秦建华	袁斌业
黄忠廉	蒋林	黎昌抱	滕超	马士奎	马婷
井琼洁	司徒伟智	刘军平	刘晓峰	吕敏	陈光磊
李尼	李斯	张免瑶	张玫瑰	徐丽莎	黄媛
蒋坚松	彭利元	谭惠妃	霍四通	戴群	

前 言

翻译史涉及的范围和取向、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翻译研究本身。翻译是积极的文化建构,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中国在翻译西方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古代的佛经翻译对我国的宗教、哲学、语言等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明清以降,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试图通过翻译吸纳西方文化,实现民族自立自强。到了近现代,我国工业建设、农业改良、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以至法制的创立与完善、市场发展与繁荣都与翻译息息相关。我国近现代历史的不同阶段几乎都诠释了“翻译强,不翻译则弱”的道理。其前提是西方先进,翻译基本上是顺向的。近些年来,在“走出去”政策的驱动下,我国翻译方向历史性地逆转。“语言服务企业的中译外工作量占比在 2011 年首次超过外译中,达到 54.4%。……我国已经从对内译介西方文化与文明为主转为对外译介中国文化和文明为主。翻译在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翻译研究院等 2014: 3—4)。我国的翻译事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里到外,无数先辈戮力译事、鞠躬尽瘁,铸就了光辉的伟业,他们的成就和精神需要我们去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

翻译史研究的核心是人,包括译者、委托人、赞助人和读者,重点是译者。委托人和赞助人固然有社会责任的担当,但只有译者和委托人同心协力,才能回答翻译的社会起因和历史作用问题。在我国各历史阶段译者兼翻译委托人的大有人在。文本只是翻译的外在介质和形式,通过人及其社会环境才能知道译作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效应。皮姆在其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中也强调: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也不是译本的社会语境,更不是语言特征,而是译者,因为只有译者负有对社会因果的责任;翻译史必须围绕译者生活和工作的语境展开(Pym 1998/2007: xxiii - xxiv)。其中“译者”也应包括翻译的组织者。

近百年来,翻译史研究以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家为核心。翻译史研究要进一步深化,必须挖掘和颂扬与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学昌盛等密切相关的翻译史料和翻译家,呈现被忽略、被掩蔽的史实,实现由文学翻译史向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转向。本研究作了这方面的努力。

一、历史传承

本研究传承历史脉络,遴选自古至今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作为研究对象,以我国不同时期的翻译事业为中心,记述他们的译事功勋,弘扬他们对我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学、科技等方面的诸多贡献。本研究以史为证,以论驭史,史论结合,突出学术性、史料性和内容的创新性;以现代译论为指导,在我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重塑以 94 位翻译家为代表的我国译者的群体形象,以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目标。

译者是翻译史研究的主体。21 世纪以来,随着翻译学科的迅速发展,翻译史研究更加深入,对翻译家个案研究持续升温,但集中在少数众所周知的文学翻译名人身上,对文学翻译之外的译家研究未予重视,研究对象扎堆、重叠。据近年的博士论文统计,“林纾研究 6 篇、林语堂研究 5 篇、许渊冲研究 4 篇、鲁迅和周作人研究各 3 篇。这些研

究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间隔,而在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上严格来说存在着一定的重复和趋同”(穆雷、邹兵 2014)。目前对文学翻译家史料的整理、挖掘和研究,史论的高度和清晰度尚嫌不足,更不用说对推动社会进步、经世致用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翻译和译者的研究。为进一步挖掘和梳理我国各领域有代表性的翻译家的丰富史料,研究其翻译思想,探寻其理路脉络,彰显其翻译成就及其在我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丰富我国的翻译史和文化史,我们组织编撰了《中国翻译家研究》。

本研究虽然以翻译家个案逐一呈现,但关注的是翻译史的整体。本研究顺应历史流脉,纵观统筹,全局策划,系统地整理历代和现当代有代表性的翻译家的译学思想、译著译事和翻译经验,重塑我国翻译家的整体形象,凸显翻译事业对我国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各历史时期翻译事业的生发、拓展和繁荣为“经”,聚焦于古代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民国时期的新文化、新学科的译介以及新中国的翻译事业;以历代和现当代有代表性的翻译家为“纬”,萃取我国千年翻译史的精华。尽管众译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的翻译思想、翻译主张、译事准则一脉相承,闪烁着我国传统文化和文论的光辉,显示出我国传统译论在历史的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与现代译论相辉映、相衔接。

本书的编辑方针是人有所长、人略我详、人无我有。不漏举世公认的译界巨擘,对一般翻译史(特别是文学翻译史)不收、不顾或语焉不详而曾名满天下、确有重要贡献的翻译家,本书详加介绍。入选本研究的翻译家包括经译家(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文学翻译家、科技翻译家(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社科翻译家(政治、经济、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

本书取名“中国翻译家研究”,但它不是纯粹的翻译史著作。考虑到我国翻译史传承脉络不断,本书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在绝大部分入选

的历史人物之外,收入二位健在的、极富代表性的当代翻译大师:许渊冲(1921—)和余光中(1928—)。许渊冲被誉为“中国译诗第一人”,一生执着中译英、法韵文及小说,译文逾千万字。他将中国古典文学推向了世界,他的翻译理论独树一帜,为译界所推崇。他于2014年荣获国际译联最高奖“北极光”文学翻译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文坛巨擘余光中是“作者、学者、译者”三“者”合一的翻译大家。他早在大学期间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在数十年的文学生涯中,迄今已出版翻译集10余种并有“翻译乃大道”等宏论,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成稿时还弥留病榻的草婴(1923—2015),未能等到本书出版而驾鹤西去。草婴被誉为“托尔斯泰在中国的代言人”,凭一己之力译完500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集,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译本已成经典。

本书总揽全局,全方位、历时和共时地选收94位人物。除了选收宗教典籍和文学翻译领域的翻译家之外,还有较多其他领域的翻译家人选,他们对我国近现代的社会进步、经济建设和学科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被写入我国社会发展史、经济发展史和学科发展史。由于我国译界对应用文体翻译(史)长期缺乏系统研究,加上其中有些翻译家在各自专业领域独树一帜,其专业上的声誉盖过其翻译事业上的辉煌,以至在过往的翻译史难寻踪影或着墨不多。我们矢志钩考,亦得踵而行之者的响应,史实史料有所弥补,但专业领域广阔、卷帙浩瀚,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计划中拟写而未写者尚有人在。不过,本研究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还能以比较完整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这为今后继续研究留下余地。

本书以翻译实践家为主体,兼顾对我国翻译事业有深远影响的创导者、组织者和翻译理论家,实际上许多翻译家实践与理论相结合,集译者与组织者于一身,特别是“五四”时期涌现的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入选者一般要求著译厚重、思想深邃、影响远大。书中所列人物往往跟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科技专家或新兴学科奠基人的称呼

连在一起。例如华衡芳与徐寿是我国早期科技专家，他们合作科学实验，以精格致善制器闻名遐迩。他们“参照西方书籍与外国轮船实体，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参与制造多艘蒸汽兵舰。”^①徐建寅除了翻译电学、声学、天文学、管理学等多种近代科技知识外，也是我国早期杰出的兵工企业管理人才。“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胡适言，转引自罗新璋 1984：160），是我国近代史上是启蒙思想家。鲁迅翻译和创作的文字各半，“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言）。

我国近现代新兴学科的发展路径，从引进到借鉴，由仿效而创立，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翻译。章士钊对弗洛伊德的译介，为精神分析这一学科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入于“西学”，出于“中学”。社会学家费孝通，作为“中国化的社会学”创始人，他的译著是其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源头，与他个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辅相成。语言学家吕叔湘“把翻译和语言学研究相结合，开创了我国的对比语言学”。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转折都与翻译活动密不可分。翻译人物的研究可以为近代以来我国思想观念的变革、文学流派的产生、科学技术的革命以及新兴学科的开创提供背景资料，人们可在其中找到蛛丝马迹。挖掘和呈现译者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翻译活动和翻译贡献，阐明其在跨文化、跨语言和跨民族沟通中的角色和作用，不仅可以丰富人类文明发展史，而且必将促进现代语言服务业和翻译事业的发展。

二、分卷立目

本研究的分卷既照顾到历史的脉络和传承，又突出反映现当代翻译家的历史重任和贡献。本书分为三卷：历代卷（古代—清末）、民国卷

^① 引号中的文字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本书的相应篇章，下同。

(1911—1949)和当代卷(1950—)。好多近现代的译家都是跨年代、跨时期的。分卷主要依据论主的生卒年份,参照其主要贡献的所属年代,按生年先后排列,生年相同者,按卒年排列。就个别译家而言,很难铢两悉称,分卷还多少考虑三卷篇幅上的平衡。好在分卷不是严格的人物历史界定。

历代卷包括佛经翻译和明清西学东渐两大翻译高潮中涌现的重要人物,从支谦(194~199—252~258)到康有为(1858—1927),共 30 人。其中林纾(1852—1924)、严复(1854—1921)、辜鸿铭(1857—1928)晚年在民国初期也有贡献。

绵延千年的中国翻译史从译经始,上起汉魏,盛于隋唐,下迄宋元。千年译经,人才辈出、卷帙浩繁,经卷总计达 15 000 册以上。本卷仅收影响深远的译经大师支谦、道安、慧远、鸠摩罗什、真谛、彦琮、玄奘、义净、不空、赞宁等 10 人。鸦片战争后,英、美等国的传教士和商人接踵来华,其中部分人士在经商、布道的同时传译科技新知或从事文化交流,一些翻译出版机构应运而生。翻译方式由开始的“洋译华述”逐渐过渡到汉人自主翻译,涌现出像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杰出翻译家。美籍学者钱存训根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目录》和裴化行《欧洲著作汉译书目》二书统计,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共 437 种,其中,宗教类 251 种,包括《圣经》、神学等方面,占总数的 57%;人文科学书籍 55 种,包括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占总数的 13%;自然科学书籍 131 种,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物理、地质、军事等,占总数的 30%(转引自宋巧燕 2011)。耶稣会士的译介,离不开中国译者的撰写和润笔。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辜鸿铭先后完成《论语》、《中庸》和《大学》的英译并正式出版,传教士翻译儒经这一传统被打破,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辜鸿铭成为近代国人独立英译儒经的第一人。

民国卷收主要贡献在民国时期、出生在 19 世纪的翻译家。只有英年早逝的郑太朴(1901—1949)和朱生豪(1912—1944)例外,郑太朴英年

在民国度过,朱生豪恰好生息在民国时期。本卷从伍光建(1867—1943)到朱生豪,共34人,几乎都是跨年代的。伍光建、张元济(1867—1959)、梁启超(1873—1929)、杜亚泉(1873—1933)、丁福保(1874—1952)、陈独秀(1879—1942)等的翻译事业开启于清末。周建人(1888—1984)、赵元任(1892—1982)、李达(1890—1966)、傅东华(1893—1971)、胡适(1891—1962)、茅盾(1896—1981)、朱光潜(1897—1986)等人的翻译高潮期在民国;王国维(1877—1927)等人的翻译贡献虽在民国之前,其影响却在民国之后;而董秋斯(1899—1969)等人的重要贡献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

只有38年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急剧动荡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属“后发外生”型,其特点有三:“(一)现代化起步较晚。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由外部世界提供,不是本土文化内部现代性因素的自然积累结果,而是出于现代化国家的外在刺激引发的反应。(二)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文化方面(特别是物质文化)的先进性所构成的威胁,迫着……自上而下将现代化强行启动。(三)‘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只有走向国际舞台……而且必须采借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与办法才能加快本国现代化的速度”(吕进2000:23—24)。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内战频仍,日寇横行,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社会剧烈动荡。另一方面,一批批有识之士抱着民主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从国外学成归来,他们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新风尚,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学的推介此起彼伏。译笔所至,学科门类之广,译著形式之多,参与者之众,堪称历史之最;此时,宗教翻译已退居下位。众多知识分子以译介国外新技术、新思想为己任。时至20世纪30年代,我国译书进一步扩大。译讯、译刊、译丛增多,翻译品种不断丰富。此时的翻译在中国社会文化多元系统中无可争辩地从边缘走向中心,涌现出成批出类拔萃的翻译家。以下仅对1921—1940年20年间的译书做一统计(转引自王克非1997:182—183),可见一斑:

民国时期的译书(1921—1940)

科目	语 文 和 国 别						总计	%
	美、英	法	德	俄	日	其他或不详		
哲 学	164	17	31	11	22	3	248	4.7
宗 语	97	10	5	—	11	—	123	2.3
语 言	25	2	4	1	1	7	40	0.8
文 学	505	210	101	239	174	233	1462	27.6
艺 术	24	4	2	6	15	—	51	1.0
史 地	491	37	29	21	53	10	641	12.1
社会科学	763	72	118	42	351	5	1351	25.5
自然科学	585	25	46	3	112	—	771	14.6
应用科学	311	2	41	3	217	—	574	10.8
总 录	23	2	—	—	13	—	38	0.7
总 计	2988	381	377	326	969	258	5299	
%	56.4	7.2	7.1	6.2	18.2	4.6	100	

辅助:(1)表中数字仅代表译书,杂志上的译文未包括在内。

(2)资料来源:平心编,《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此书目从1912—1940所出版新书计20000种中,列出4159种译本;又图书季刊英文版,1935—1940收录译本1140种。

民国短暂的38年,在千年翻译史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片段,但因其间人才辈出,译书浩瀚,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民国卷汇聚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翻译家。

当代卷的人物均出生于20世纪,大多成长在民国时期。他们兼有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熏习,中外兼修,博古通今。其中不少人在民国时期已有建树,有的甚至到达译事的巅峰状态。如熊式一(1902—1991)早在1934年于英国伦敦将京剧《王宝钏》^①翻译成英语并搬上舞台。“熊式一是与林语堂并称海外的双语作家,在英语世界撰写并执导戏剧的中国第一人。西方文化界有‘东林西熊’的说法——美国文化界佩服林语堂,青睐其《京华烟云》,英国文化界佩服熊式一,钟爱其《天桥》”(走

^①我国报刊提及熊式一20世纪30年代用英文翻译和导演的中国戏剧 *Lady Precious Stream* 通常有三种中文译名:“宝川夫人”、“王宝钏”与“王宝川”,熊译“王宝川”。

近熊式一 2012)。吕叔湘(1904—1998)的全部文学翻译作品完成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他专注于语言研究和语言教育,译著不多,着重于撰写语言学和逻辑学方面的专著。冯至(1905—1993)20 世纪 20 年代始发译作,三四十年代为鼎盛期,50 年代后少有新译,以旧译新版为多。

当代卷汇聚一批新中国成立后对翻译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重要人物。其间,我国翻译事业历经前 17 年的计划经济时期、10 年“文革”停滞期和改革开放后的繁荣期,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7 年间,我国……英国文学译作出版了 245 种,美国文学译作出版了 215 种”(孙致礼 1996: 42)。两者相加,英美文学译作出版共 460 种,据孙致礼“17 年间我国英美文学翻译出版一览表”(孙致礼 1996: 221—239),460 种新中国成立前初版的有 51 种,加上有一批早前译竟、成书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译作(如朱生豪“莎士比亚戏曲集”十余种),这 460 种是要大打折扣的。前 17 年出版的数量与上表民国中期英美译作 505 种相比,就略显逊色了。

17 年中受翻译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文学翻译趋弱,科技翻译加强。1953 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发轫,1956 年向科学进军,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科技情报系统,不同专业的译刊、译丛相继问世,对西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著作大量译介。总的来说,翻译规模空前,译书浩瀚,科技翻译队伍空前庞大。翻译对社会进步和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淡化或部分消解了文字工作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偏颇。当时翻译工作组织化、社会化,除了少数文艺和专业译著署名之外,很少有译者署名出版。董乐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从事翻译工作,但长期没有称得上他个人劳动成果的东西,直到 1973 年《第三帝国的兴亡》再版。他说:

尽管从 1949 年冬天起,每天报上都有我的译文发表,有时还占整个一版或半版的篇幅,但是这都是集体的成果,算不到个人头上……第一次标上我个人名字的译作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这也是一本集体译作,参加其事者有九人之多,只是由我统一润饰而已。1973 年再版,出版社

又让我校订修改一遍。(转引自当代卷“董乐山”篇)

“文革”十年,文学翻译、社科翻译停滞,科技翻译并未间断。改革开放后,我国翻译的全盛时代到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等一个个翻译图书出版工程相继恢复或启动,一批又一批的译刊、译报陆续恢复或创办,各路翻译工作者又挺起腰板投入他们心向神往的事业。

三、译家描述

译家描述要交代五个问题:何许人?为何译?译什么?怎样译?译效如何?我们把它分解为五个部分:1. 生平简介——翻译家成长的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熏陶);2. 翻译活动——翻译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翻译动机、活动方式和事件;3. 翻译思想——翻译家对译事的原则主张或基本理念,“理论化的方法论”;4. 著译介评——对翻译家成果的评论,包括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段的介绍;5. 翻译影响——论主的翻译思想、翻译理论、翻译活动及其著译带给后人的启迪和进益。翻译家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索译者素质的养成、成功的动因和环境,包括从事翻译的心路历程、翻译观念、选题偏好、翻译策略、翻译影响等一系列主客观翻译语境因素。当然,对于以上五个方面,撰写者因掌握史实的多寡和写作偏好的不同,侧重点有所不同。以下就这五个方面略作展开。

1. 生平简介

生平简介是译家人生的粗线条,由此洞察其一生的走向。诸多译家的人生道路不一,但几乎都是一部励志的奋斗史。他们中有的困顿不挫求学之志,贫贱不夺立业之望,历经艰难困苦,矢志翻译事业,终于修成正果。有的天资聪颖,童时已见端倪,少勤敏,翻译不辍,持之以恒,至老不衰,为翻译而生,为翻译而终。有的家学渊源,好读书,及稍长,漂洋过海,求知访学,归国后大展宏图……

鲁迅先生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

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鲁迅 1996: 430)。皮姆翻译史研究的第一条原则是:翻译史应当解释译文产生的特定社会和特定地点(Pym 2007: xxiii)。翻译家身处时代漩涡,有的引领潮流,以介绍新思想、新文化为己任;有的驰骋于域外异地,会通于达官政要之间;有的历经跌宕起伏,但翻译之心终生未泯;有的宁静致远,心无旁骛,笔耕不辍,在特定时代留下了传世之作。

2. 翻译活动

人的发展是其在实施“活动”过程中,通过社会互动来实现的。翻译家个体的翻译活动一方面具有时代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有他个人的特点。诺德认为,“翻译行为中的源语文本只是‘提供信息’。面对所提供的信息,包括译者在内的任何接受者都会选择他们感兴趣的、有用的,或适合他们表达目的的信息”(Nord 2001: 25—26)。研究译者翻译活动中的动机和目的或许更有助于深入理解译者。

古代中国的经译家们为求佛经而留学印度,形成了当时“时代的运动”。大师们不但翻译经典,而且带来了智识和技术,他们在西域和印度间的游历也成了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的媒介。明末开始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之间翻译活动主要以“洋译汉述”方式进行,西人口授,汉人笔录并润饰成文,翻译工作受制于人。清末,我国陆续建立翻译机构,翻译工作逐步自贍,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翻译家。民国以后,参加翻译的人更多了,西方文化思潮涌动,外来的文学艺术、社会政治、科学技术读物不断地被翻译、出版,译者满腔热情地投入翻译活动。

对于不少翻译家而言,翻译活动只是其整个活动的一部分,还需参照别的活动比照研究。鲁迅、茅盾、老舍等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促进了翻译活动;反过来,翻译活动滋养了其文学创作。科技翻译触发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的工业实践活动;反过来,工业活动也寻求翻译的帮助。

3. 翻译思想

“如果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行为,一方面翻译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历

史条件,另一方面翻译实践又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构建了近现代国人的精神和思想”(廖七一 2010: 1)。翻译思想表现为对译事的某种原则主张或基本理念,往往有阶段性,通常经历三个阶段:体验(experiencing,集中于对方法的实施 WHAT)、体认(knowing,集中于对规律的把握 HOW)和体悟(apprehending,集中于对理念的领悟 WHY)。例如,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的道安,对佛经汉译的看法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由随感而发到自觉规范的发展过程。在人长安之前,道安对佛经译文的质朴和文饰,观点并不十分明确,甚至在不同场合有矛盾;而在之后主持佛经翻译时期,出于规范和指导翻译活动的考虑,他的主张明确起来,即要求译文质朴全译,反对译文删略文饰,同时又给予有限的灵活性。又如,鲁迅的“硬译”并不是一开始有意提出的,也没有想要上升到理论高度,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在翻译理论书籍中尚未找到更好的译法,便只得“硬译”。然而“硬译”一提出便受到梁实秋的指责。针对梁氏的文章,鲁迅发表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系统地阐明了“硬译”思想。所以,促成翻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有翻译的内部因素,也有翻译外部生态环境的原因。

在我国翻译史上,像鲁迅、茅盾这样自觉地、有系统地论述翻译的并不多见,大多只是在译本前言后语、序跋注疏、奏文中略陈己见,有的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袒露心迹;有的甚至不落笔墨,渗透在译文之中。译本是翻译家思想的产物,翻译思想往往只能通过分析译家的作品说话,即通过论主的代表性译作来阐述他的翻译思想。当然掌握材料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提炼、分析和研究,用现代译论的元素来激活前人思想的亮点。

4. 著译介评

介绍和评论论主的代表性作品,探寻他们的理路脉络和心路足迹。翻译史研究涉及翻译实践与历史语境的交织。翻译家都出色地掌握翻译活动必需的“工具技能”。“工具技能”包括双语语言技能、使用翻译工